

真实包含在虚构中

——评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的叙事艺术

胡凯茵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文章从叙事声音的角度分析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真实与虚构的转接艺术，通过研究小说中叙事对象女学生与歌女群体的对比与反差，发现书中蕴含的人性真实，旨在从真实与虚构关系处理的叙事技巧出发重新解读该作品。

【关键词】真实；虚构；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叙事艺术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574(2022)01-0022-03

小说的虚构力在历史的洪流中逐渐冲破了以柏拉图镜喻说为代表的主流“文学是对现实的反映”的观点，超越对历史和现实的模仿，拥有独立的一席想象叙事之地。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南京沦陷区一座殖民地教堂里发生的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故事中，历史事实与故事情节互相缠绕，人性真实被包裹在虚构的小说外壳中，贯穿全篇。《金陵十三钗》所展示的是战争时期的人的根本关系和本性精神。

一、叙事声音中真实与虚构的转接技巧

首先，叙事声音确定真实的历史回望。《金陵十三钗》的叙事声音在开篇即明确：故事设置的背景是抗日战争中南京沦陷以之后的一段日子。虚构的小说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中，需要叙事声音着重把握情节发展的时间脉络与地理位置情况以凸显其真实性。因此叙事声音也多次精确地指出南京沦陷的具体时间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有论者也证实战地记者斯诺的《南京的浩劫》有关该小说歌女拯救女学生原型的记录是“实为‘金陵十三钗’故事‘史’的源头，‘诗’的出处”。叙事声音也适时添加具体发生时间，甚至地点，如指明埋尸队队员在江边被杀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具体描述在占领南京后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恶行事实、指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晚王浦生与豆蔻相爱、指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凌晨两点三个军人和陈乔治牺牲。可以发现，叙事声音在具体而精确的点明故事发生时间与地点的同时，也暗含了对历史回顾与思考，以多次渲染具有浓重血腥味的残酷杀戮中日本侵

略者的冷漠和贪婪故事细节表明了叙事者的态度。当南京大屠杀这段令所有中国人难以忘记的惨痛记忆被作为历史背景存在于《金陵十三钗》时，整个小说自然带有厚重的历史感。而叙事声音对日本侵略者罪行不断地着重刻画，更突出了叙事者对这场灾难的同情与痛心。

其次，叙事声音聚焦虚构的孤岛故事。“《金陵十三钗》的著书灵感，来自严歌苓对悲惨历史的‘再现’大欲望，记忆重构则秉持‘小空间’的预设和强调。”叙事者如要回溯历史进行叙事，选择聚焦于小空间，利用真实的南京大屠杀历史与虚构的孤岛故事形成鲜明的大小关系，以小见大的方式展开故事是相对容易的。虽然叙事声音曾将故事情节发展的地点转移到殖民地教堂近处的水塘、长江边侵略者埋人坑等场景，但总体上是以“我”的姨妈孟书娟为这部小说的叙事视角的观照出发点，展示给读者的皆是经过她心中尺度过滤了的故事。而如小说中所言“进南京难于上青天，出南京等于上天外天”

110，在南京沦陷区的殖民地教堂失去与外界联系，是一座孤岛的叙事空间。《金陵十三钗》的叙事者“我”并非全知全能，“我”通过孟书娟的眼睛观察到的只能是南京沦陷前后殖民地教堂里发生的事。在殖民地教堂这座虚拟孤岛中先后共容纳了神职人员、教堂伙计、女学生、歌女、军人等不同群体。叙事声音则通过强化不同群体的特色，以孤岛有限的生存资源尤其是水和食物为前提，以躲避日本侵略者、在危难中存活为共同目的，激化不同群体矛盾。在虚构的孤岛空间中，叙事声音聚焦的几个群体却都具有历史真实性，如英格曼神父和与阿多那多

神父代表的神父群体笃信上帝、清修读经、带有美国人鄙视其他种族的傲慢，较好地还原了当时中国社会美国神父的形象；而阿多那多神父作为只有外国人面孔的中国人，其对于中国文化的归属感和对美国文化的仰慕感交错的复杂感情亦具有中外文化碰撞对个人影响的历史真实性。

最后，叙事声音凸显虚与实的转换艺术。《金陵十三钗》“以历史纪实和小说虚构的组合为纬，以故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为经，‘我’则成为这个时空之网中自由穿行的评述者”，全篇叙事者虽然为物叙事者，但叙事者“我”却经常隐藏在第二叙事者即孟书娟的第三人称叙事中。在一定程度上，这部小说的叙事者是“若隐若现”的：当故事发展到几令读者信以为真之时，“我”的叙事声音会在情节补充处突然出现，使用想象的手法，将故事情节从虚构的真实带入真实的虚构中，比如在孟书娟的叙述中国国民党军官戴涛是故事中真实存在的人，但在戴涛初到教堂地下仓库时玉墨与他的谈话孟书娟透过透气孔无法偷听到，于是“我”就凭借想像继续进行叙事，描述二人的对话，补充玉墨和戴涛在空军俱乐部的经历。如此写法并不会影响故事发展的主要方向，但会提醒读者这个故事很多内容是叙事者“我”自行补充的，并非真实，也在反面进一步强调“我”通过孟书娟看到的在殖民地教堂发生的系列故事，的确是真实的。“我”的叙事声音的介入，一方面使得情节灵活地以预叙、倒叙、补叙等多种手法展开而不显突兀，另一方面使得《金陵十三钗》的谋篇布局更显张力，在“我”所在时空也即读者阅读的当下回顾历史真实的同时增添了以虚构力筑起的立体殖民地教堂。

二、对比与反差：人性真实的唤醒与展示

上文提到《金陵十三钗》殖民地教堂“孤岛”容纳了几个群体，其中小说的主要叙事对象女学生群体与歌女群体的矛盾最为激烈。小说正是通过对比叙写两个群体的不同和冲突、故事情节发展引起的群体转变形成的态度反差，来凸显在战争面前的人性真实。

一方面，女学生与歌女的虚构形象对比，引出真实的人性两面。在《金陵十三钗》中以孟书娟为代表的女学生群体与以

赵玉墨为代表的歌女群体形成鲜明对比。孟书娟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年轻学生，性格倔强又有少女的敏感，而赵玉墨却是出身卑贱，久经风月场所的秦淮名歌女，两个具有身份的巨大差异的人却在南京沦陷的背景中在殖民地教堂中相遇，叙事重点落着她们上面，则具有了极大的戏剧张力。虽然二者是小说中的虚拟形象，但是她们所代表的两种群体的并列出现正是那个年代特殊的真实存在：民国时期，女性开始进入学堂成为女学生，但歌女仍是合法职业。在此背景下，在这部小说中，女学生与歌女的强烈对比，主要凸显在二者在性方面的成熟度，《金陵十三钗》多次利用此种对比来标注二者：女学生稚气未脱、未谙世事，对于性，她们是懵懂的，也是深以为耻的；而歌女是美艳动人、妖娆多姿的，对于性，她们再熟悉不过，甚至经常将相关用语挂在嘴边，以豆蔻、红菱为甚。

女学生与歌女的对立也正如人性两面的对立。人性的真实是对欲望的追求与满足，但在社会实际交往中要求人们的行为表现必须保持规范约束之内。女学生的纯洁是美好的，但歌女的大胆与自如亦是人们心中所想。在面对跳出社会规范约束的群体或个人时，遵守社会规范的群体或个人，便会对前者产生厌恶情绪。梳理叙事脉络可以发现，歌女们通过委婉哀求兼着撒泼打滚的方式闯进教堂，而军人戴涛则是自己偷偷潜入教堂，李全有一行人是以生命垂危的王浦生为筹码的获得留在教堂的许可证的，三者都会威胁到藏身于殖民地教堂的女学生群体，但女学生们显然并不讨厌后两者。女学生群体对歌女群体的讨厌不仅是因为歌女群体挤占了她们的生存资源，更是因为歌女群体是不一样的，是超出规范的。但是人性真实又使女学生们有跳出规范的潜意识，就连女学生孟书娟在观看赵玉墨的舞蹈表演，欣赏赵玉墨美丽的身姿时，也不得不承认，她是羡慕赵玉墨的。

另一方面，从鄙夷到怀念的态度反差，呈现真实的奉献精神。前文提到，在南京沦陷区殖民地教堂的孤岛环境中，生存资源有限。而歌女群体作为殖民地教堂的不速之客，既是物质资料的竞争者，又是异类，自然会受到女学生群体的鄙夷。但歌女群体的特殊与魅力让女学生们既鄙夷又好奇，而这样矛

盾的态度，体现在女学生出口辱骂歌女、偷拿歌女东西、偷窥歌女生活等情节，其中以孟书娟反感赵玉墨，屡次以言语羞辱赵玉墨，又屡次通过透气孔去观察歌女们尤其是赵玉墨在地下仓库的活动最为突出。

女学生的鄙夷态度从赵玉墨等一众歌女决定代替女学生成为日本侵略者所谓慰安妇一刻开始转变。情节发展推动歌女们换上黑色水手裙和黑礼帽，歌女成为女学生，女学生也懂得了歌女。赵玉墨等一众歌女的决定意味着什么，她们的离开意味着什么，孟书娟懂，女学生们也都懂。因此后女学生们纷纷下意识地模仿歌女们的行为来怀念她们，而孟书娟更是寻找了赵玉墨几十年。在豆蔻事件之后，歌女们明知前往何种处境，但她们依旧选择了自我奉献来保存那份女学生稚嫩和纯洁。“整个故事演绎了人性在家仇与国恨之间的升华”，英格曼神父保护教堂，军人保护女人，歌女保护女学生，情节层层递进，保护与被保护的塑造过程的完成同时亦完成了生命的接力，殖民地教堂“孤岛”每一个自我奉献的人换来了女学生的安全，换来了中国新生的希望。“虽称不上战争小说，但它极大地关注了战争（沦陷）环境中人性的分化，写出了义利、善恶在人性中的交战，着墨于战争对人性和自我的重塑力量，以及女性在特定历史情景下的人性挑战，实际上抵达了战争时期人生的深处。”作为《金陵十三钗》虚拟故事中的人物，秦淮歌女群体是于国家风雨飘摇之际挺身而出的血肉群像，是于人性泯灭的黑暗岁月的一点希望光芒。秦淮歌女们拯救女学生们的行为不仅是女人对女孩的保护，是国家危亡时的大义之举，是更是人对于他者的奉献精神。不可否认的是，千千万万这样为国家、为未来牺牲自己的先辈许多是底层民众，在奉献精神的支撑下，他们为保存国家人员有生力量，争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金陵十三钗》用人物的对比与反差成功地塑造了其中一群这样的人。

结语

《金陵十三钗》通过抗日战争南京沦陷真实历史背景讲述饥寒交迫的生存困境中英格曼神父先后收留了女学生、妓女、军人等，后两者却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中自愿牺牲以保全女学生

的虚构故事，塑造了一群立体人物，成功地表达了在战争中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与自我精神，以文学处理的方式试图引起世界范围内读者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关注。而在小说创作中如何运用叙事艺术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微妙关系，尤其由此阐发的如何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基础书写好的虚构故事，还有待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 [1]孙正军.从“史”到“诗”——关于“金陵十三钗”故事[J].扬子江评论,2016,No.57(02):28-34.
- [2]刘中望,向宇.战争、女性与权力——论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的空间书写[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49(04):63-69.
- [3]严歌苓.金陵十三钗[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4]李燕.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研究[D].暨南大学,2008.
- [5]王春梅.华人作家笔下南京大屠杀题材作品的主旨[J].电影文学,2017,(08):79-81.
- [6]邢楠.严歌苓小说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9.